

未婚成年男性眼中父子關係之現象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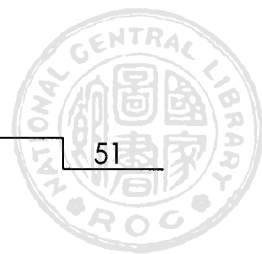
陳韻如

摘要

本研究旨在理解未婚成年兒子對其父子關係與互動的看法、感受、及對此經驗所賦予之意義，並藉由詮釋現象學的方法，揭露父子關係背後所蘊含的深層意義。研究針對五位未婚成年兒子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結果發現，言語對話成為受訪者詮釋父子互動樣貌的界定標準。他們眼中的父子互動隨者子代生命週期發展逐漸由「親」到「疏」，且成年後父子互動「淡然」的現象普遍存於受訪者間。有趣的是，這些與父親互動少之又少的受訪者，卻自評父子關係並不差，他們有著自己的詮釋方式，相較於西方強調外顯情感的表露有著不同的文化意涵。此外，面對淡然的父子互動，這些成年男子並不想改變現狀，卻同時以自身的經驗去期許未來自己成為父親時，父子關係要有所突破，顯示兒子對現階段父子互動關係的詮釋與日後擔任父職時的自我期望，在時代變遷與傳統文化的衝擊中，同時衍生成代間傳遞與代間轉化的矛盾內涵。但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華人父子的互動關係仍難脫離傳統父權文化、父/子職規範、以及性別角色所限制的框架。

關鍵字：父子關係、父權文化、父職

陳韻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博士候選人
通訊處：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20巷25弄37號3樓
E-mail：novia417@gmail.com



壹、緒論

一、緣起

曾在電視上看到一段廣告，廣告中一位父親在客廳裡等候孩子回家，約末二十多歲的兒子進家門後並未搭理父親，直接進入自己的房間把門關上，迫不急待地坐到電腦前，戴上耳機與麥克風，開始與網友在連線遊戲中一同廝殺敵軍。當他與線上同伴成功達成任務的剎那，隔壁的房間竟也爆出歡呼的聲音，兒子才發現，原來剛剛與他一同共同作戰的網友，竟然就是自己的父親！雖然只是短短十數秒的廣告，卻令我感觸良多，因廣告中的父子關係便猶如我的父親與弟弟，可惜的是，在我們家，一切的情節通常在弟弟關上房門後就無聲落幕，已不知幾年沒有聽過父子倆聊天的聲音。

隨後在與好友的聚會中分享這個話題，才發現同樣身為女兒的我們，與父親的關係品質及互動頻率都還不錯，但家中的未婚成年兒子與父親的互動情形，幾乎都被這些女性形容為「冷漠」、「沒有互動」、甚至「連講話都沒有」。有趣的是，大家卻又澄清：「可是他們的關係也不是說不好…」，可見，以往我認為關係品質乃由互動親疏而來的觀點，在此部分似乎是不適用的。我不禁好奇：這樣的現象是否為部份人類的共通經驗？究竟是何種因素造成父子關係或互動如此「淡然」？未婚成年男性又是如何詮釋他們的父子互動關係？

綜觀過去國內外親子關係研究，已有數十年的歷史，且針對不同的人類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探究焦點。一般而言，從子代出生到幼兒階段，需要父母給予的照顧最多，因而此階段的研究多探討親子依附關係或父母職對幼兒各方面發展的影響（涂妙如，1998；Dunifon & Kowaleski, 2002）。待子代進入學齡階段，研究焦點轉而探究親代的親職參與、教養態度、或管教模式與兒童行為、自我概念、生活適應、價值觀或學業成就間的關係（王正婷，2007；蔡玉瑟，1996；Karazsia, & Wildman, 2009），此類研究更是親子關係研究的大宗。至青少年階段，由於子代發展漸趨自主，對來自親代照顧的需求及父母的權威性皆大幅減弱，親子關係逐漸轉入較為平等的地位（Wintre, Yoffe, & Crowley, 1995），此時研究興趣多聚焦於親子間的衝突或調適（蔡素琴、廖鳳池，2009；Doorn, Branje, & Wim, 2011）。到了親代進入老年期，無論在社會性、財物性、勞務性、乃至於文化上，兩代之間開始產生「反哺」現象，此時期國內外研究的興趣乃轉至兩代間的情感連結、代間矛盾、子職、以及代間交換等議題（林如萍，2000；高淑貴、林如萍，1998；Katz, Lowenstein, Phillips, & Daatland, 2005）。然，對於未婚、處於成年期、經濟能力又尚未十分成熟之子代的親子關係特性如何，是我由以往研究中較難窺探的部分¹。



此外，過去研究在探討親子關係時，多視「父母」與「子女」雙方為一整體，性別僅成變項之一，雖能看出其在親子關係上所顯現的差異性，卻較難描繪出同/不同性別間親子關係之情境脈絡（劉惠琴，2000；陳安琪、謝臥龍，2009）。近年來，國內外雖已開始有研究針對親子雙性別對偶關係（母女、母子、父子、父女關係）分別加以探討，但整體而言，無論在親代或子代的焦點性別選擇上，仍以女性較常出現²，相較之下，以父親為主軸的親子關係探討較少，針對成年期未婚兒子為焦點的父子關係探究更是鳳毛麟角。鑑於此種男性代間關係研究的不足，加上許多成年期子女的親子關係研究多由親代發聲（Ward, 2009; Pillemer, Suitor, 2007; Peters, Hooker, & Zvonkovic; 2006），本研究乃將研究主體聚焦於未婚成年兒子，嘗試由他們的眼中探究其與父親的互動關係經驗，瞭解他們的詮釋與感受。研究者認為，我們選擇如何接近、理解現象的方式，同時也代表我們看待世界的思維方式與哲學觀，因此，我選擇以詮釋現象學（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作為本研究的方法論³。

二、研究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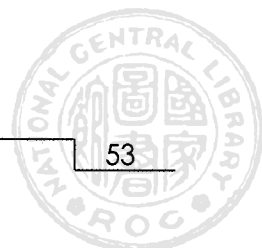
本研究的目的即藉由成年男性的敘說，開展其父子互動關係景況，以探究成年兒子如何經驗與理解他們與父親之間的生活世界面貌。我由自己與周遭親友的家庭經驗出發，看到了某部分可能存在的共通經驗，使我想更進一步去開展、接近、與理解這種父子互動關係的現象。本研究主要的關懷包含：未婚成年男性眼中父子互動關係與經驗為何？未婚成年男性又是如何看待、詮釋此經驗？影響未婚成年男性父子關係親疏之可能歸因為何？

¹ 過去相關研究中，子代部分多以經濟能力較為成熟的30歲以上的族群為主，進行與孝道、代間交換或情感連結的議題（如卓馨怡、利翠珊，2008）。多數研究也未將成年子女的婚姻狀況納入考量，然，子代是否進入婚姻確實為影響親子關係的重要因素，應加以探討（如利翠珊、張好玥，2010，在探討代間照顧關係時，即發現婚姻為子女照顧親代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此外，成年期十分之長（20-60歲），每一階段的親子關係應隨著兩代不同生命階段與任務而有不同變化（如李瑞婷，2006，即針對成年前期的子女與退休父母的親子離合關係進行探討）。

綜上，本研究所聚焦的未婚成年父子關係應有其探討的價值。

² 研究者發現國內外研究中，以「母女關係」之研究數量大於其他三種親子雙性別對偶關係組合。吳嘉瑜（2004）文章中也發現母女關係的探討較母子關係豐富許多。

³ 至於選擇此種方法論的理由，我於「參、研究方法」中解釋。



三、我的先設結構

Heidegger (1927) 認為人若要理解一現象，需透過理解的「三重結構」，包含：「前設 (Vogriff)」、「前有 (Vorhabe)」、以及「前見 (Vorsicht)」。¹ Heidegger 認為當人把注意力在某一問題，並用一個結構性的概念模式來把握對象時，即是「前設」在發揮功能；而人對於其生活世界的現象理解，永遠無法超出「前有」的範圍；而當人要理解「生活世界」中的某一對象，亦需根據一個預先設定的立場或觀點（即「前見」），才能作「首度切入 (first cut)」²（陳嘉映、王慶節譯，1927/1999）。易言之，我們在詮釋某現象之前，事實上已有先前理解存在，是瞭解事物的基本條件。Palmer (1969) 亦認為個人必須以自己存在的實在性作為參照點，並以他自己的「生活世界」作為「視域」 (horizon)，來界定一存在物，他才能獲得有關該客體的正確知識，從而作出正確的判斷（引自黃光國，2003）。

「視域」是從特定的角度所看到的整個視野，是有限同時也是開放的（畢恆達，1995）。我理解要完全跳脫自己的視域以進入他人的生活世界是不可能徹底做到的，那麼意義的共同建構者（我）的先前理解就應在研究前覺知，並在研究過程中不斷省思，以接近所關懷者的真實生活世界。以下即從兩方面來揭露、構築我的先前理解：第一部分先針對本研究所謂的「關係」與父子關係內涵進行理解，接著針對過去華人父子關係之論述與研究發現進行討論。

（一）從「關係」到「親子關係」再到「父子關係」

「關係」就是「人際關係」，指人與人互動時存於的關係，是對二人（或多人）都發生影響的一種心理性連結（張春興，1992），更廣義的人際關係甚至可包含文化制度模式（張宏文，1992）。在各類關係中，家人關係最引人注目，因為它具有：最普遍、最基本、最早、最持續、最親密、影響最深遠、最具韌性與適應性等特性，也是華人教化的重要依歸（楊國樞，1998）。其中親子關係被視為父母與子女間互動所形成的一種人際關係，包括親子之間情感上的交流、信任依賴程度、對待方式，及親子雙方在語言上的交談與溝通等，是較屬於個人感受的部分（李玟儀，2002）。可見，「人際關係」在理論本質上應已蘊含「互動」的內涵，且除互動性之外，親子關係還具有長時性、多變性及權力不等或移轉等特徵。

承上，本研究所謂「父子關係」即是父親與兒子之間的互動意涵，包括互動親疏、頻率、模式、以及情感認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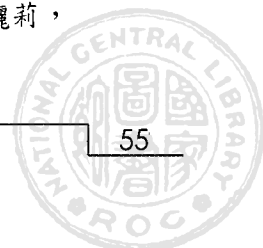


(二) 華人父子關係相關論述與研究發現

以系統觀點來看，所有的人際關係都應回到脈絡中去瞭解，即便是微系統（家庭）中的雙人關係，事實上也受到大系統的影響。再以心理學的觀點來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特定文化脈絡中的人，因此進行研究時應有三種主體性存在：被研究者的主體、研究者的主體、及他們共處文化的主體性（李美枝，1998）。因此，在探討微系統的雙人關係時，有必要考量整體社會文化對於雙人關係中個人角色定位與規範的影響。尤其華人家庭中主要的雙人關係為父子軸，與西方以夫妻軸為主的家庭制度有所不同，若要探討華人父子關係，必須考量文化對父子關係的影響。

由典籍中對於父子關係的闡釋，可看出其在儒家思想中居於非常核心之地位。陳小雲（2006）從論語中探究父子關係，發現兒子要遵守孝悌原則、要有順從觀念與敬意、對父親之愛要勝於公理，所呈現的是一種「上下有序」的關係。鄭家棟（2003）整理典籍中關於父親角色與父子關係的論述，發現父子關係是互惠且相互制約的（如管子形勢篇中認為「父慈」與「子孝」間存有某種因果關係），且子代必須「遵從父命」。可見，華人父子關係在歷史洪流中，父親代表了強大不可質疑的絕對威嚴性（蔣愛莉，2008），受此父權文化影響，父子並非是「親密關係」而是「權威關係」。莊耀嘉與楊國樞（1997）也發現，「親疏」和「尊卑」是華人角色規範的根本認知向度，在兩向度上皆應「有序」，以合乎「禮」的模式。因此，在父權文化、親疏尊卑有序、以及絕對孝行的子職角色規範強調下，更強化了父子間的相對權威差距與支配性關係，使得華人兒子對父親往往是敬畏多於親愛，正如《禮記·表記》所云：「父，尊而不親」。

二十世紀後，性別平權逐漸受到重視，華人家庭結構也由父子軸的大家庭慢慢轉為以夫妻軸為核心的家庭型態，家庭內部的關係與互動法則也逐漸由男性中心轉向性別平權、單向強勢流向雙向均勢、個體自主取代集體意識（陳安琪，2003），使得父子關係從「家本位」逐漸移轉到「人本位」，「好哥們」的關係似乎愈來愈多，過往父子間的「從屬關係」或「單向強勢」不再是單一的互動模式。性別平等意識高漲的結果，父職亦由過去工具性的賺食者角色，逐漸而具有遞補、玩伴、甚至情感角色的趨勢。除了父權文化的傳承與性別平權意識的興起，影響父子關係的因素可能還包含了：上一代父子關係代間傳遞的影響（Bowen, 1976），子代可能因成長過程中耳濡目染上兩代父子的互動模式而有世代傳遞的效果。再者，父子兩代因個人生命階段的任務與角色規範不同，使得父子關係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展現（蘇建文等人，1991），伴隨角色規範而來的父/子職也有階段性的內涵改變，兩代間無論在情感、資源、價值觀、文化、甚或各種新事物的了解和使用，逐漸由過去「上到下單向傳遞」，出現了「反哺」的現象（林昭溶，2005），子女可回饋予親代的內涵更多，使得「盡孝道」有了更多的表現。研究也發現，若父母違反親職的角色規範，也會影響親子關係的良窳（許詩琪、黃曬莉，



2009)。此外，華人對於性別角色的一些既定印象也會影響父子關係，例如華人強調「男子氣概」，此「陽剛氣」抑制了男性在情感上的表露，也使男性認為同性間忌諱有過於親密的展現（邱珍琬，2004；陳安琪，2003）。究竟這些未婚成年兒子的父子關係是否仍受上述因素影響或已隨時代變遷而有所轉化，是我十分好奇的。

貳、研究方法

一、為何選擇詮釋現象學

本文之目的不僅想透過成人男性的經驗覺知與語言以揭露其父子互動關係現象、理解成人男性如何詮釋與建構父子關係，更希望能帶領讀者靠近這些成年男子的經驗，由中讀出對自身的意義。要達到上述目的，方法上必須有現象的展示與解釋。以方法論來說，詮釋現象學是描述性的（現象學）方法論，對現象進行探究，同時它也是解釋性的（詮釋學），因為它聲稱任何現象都可解釋。Heidegger認為，當我們透過語言去呈現生活經驗的事實時，這已經就是解釋的過程⁴，因此，他認為現象學所說「必須在完全沒有預設立場與期望的前提下，讓現象顯示他自身」是不可能的，因為所謂真相並非在那兒等著被發現，而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帶著先前理解，並透過不斷「互為主體」的辯證性互動、溝通與對話過程，以尋找經驗背後的組型，並對此經驗意義加以探索與解釋。以本研究目的來說，詮釋現象學最為合適。

二、研究對象

既然為詮釋現象的解釋性研究，受訪者數量並非主要考量重點，重點在於對象是否能夠提供豐富的經驗與現象資料。本研究採立意與滾雪球的取樣方式，共邀請五位受訪者（基本資料表請見下頁）參與。選取的標準主要有二：（一）受訪者必須年滿20歲且未婚，理由是希望避免因子代成立新家庭後，因家庭結構、生命週期、以及階段任務改變所帶來的對父子關係之影響；（二）親代父親必須健在，以避免喪父者進行回溯時記憶失真的可能性，去除時間發酵效應，以期更能接近受訪者現階段的父子關係與互動世界樣貌。

⁴ Heidegger晚期提出「語言是存在的家」的著名論點，認為人對於什麼是「存在」的問題必須以語言作基礎，此種言說是以「自覺」與「領悟」作為基礎的，其主要任務並非要向他者溝通信息，而是一種存在價值的呈現。他以詩歌做為例子，事實上詩歌所「召喚」的內容並不一定是作者給我們的，而是詩句本身「講」出來的，端看我們聽到什麼、如何賦予意義（黃光國，2003）。



至於父親部分，本研究則不做任何限制，將父代視為一異質性團體。實際上找到的受訪者父親也是如此，年齡由55歲到72歲不等，工作狀況與領域也各異，期望理解未婚成年（20-30歲）兒子眼中父子關係是否有共同或異質的意義呈現。

表1 參與研究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年齡	學歷	職業	父親年齡	父親目前職業	手足/性別
洪先生	29	碩士	工程師	58 (中年)	計程車司機	兩位姊姊
葉先生	30	碩士	研究助理	72 (老年)	已退休 (工)	獨生子
張先生	29	碩士	公務人員	60 (中年)	在銀行任職	獨生子
金先生	21	大學生	打工族	55 (中年)	牙醫轉業為藝文中心老闆	一位姊姊
陳先生	28	大學	法務助理	62 (老年)	已退休 (商)	一位姊姊

註：洪先生未與父親同住。金先生與父親只有在週末時間同住。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Heidegger (1927) 認為理解具有指向性（可指向自己或世界），是一種朝向各種可能性的過程，他稱之為「詮釋(die Ausbildung)」。而人在理解自己與世界之後，就可進一步藉由「言說」(Rede：可理解的清晰表達)表現出來，在詮釋及言說中所表達出來的就是意義(Sinn)所在(陳嘉映、王慶節譯，1927/1999)。因此，本研究乃採半結構的深度訪談法為主要蒐集資料的方式，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間約60-120分鐘不等，請他們談談「平日與父親的互動」及「自覺的父子關係與情感」等開放性研究問題，過程中若有不清楚意思之處，也會請受訪者舉實例加以說明或是由我覆述請他們確認，目的在於不扭曲其原意。在訪談過程中，我也會適時地進行自我揭露，分享我家中的經驗，藉由同情擬情與視域融合的方式，使我的角色轉化為共同參與的意義建構者。此外，為避免與父親同住的受訪者在家中進行訪談時，可能會因父親在家而有所影響，我多半約在學校的空教室內進行訪談，由於該處較為安靜，進出的人也不多，除不受干擾外，也可提供受訪者心理上的安全感。訪談後所有錄音資料皆轉譯為逐字以作為下一步資料分析之用。在進行逐字搞謄寫、閱讀與分析時，我會再以電話訪談方式進行追問或確認，平均每位受訪者電話訪談1-2次，每次平均30分鐘。

在資料分析部分，詮釋現象學並沒有一定的資料分析規格或方式，但是否有把握住所謂「詮釋循環」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關鍵。Heidegger (1927) 認為，人在對某對象進行理性認識之前，它已經存在於我們的「前有」之中，我們對它皆存有某種「前見」，才能對它進行認識；認識的結果又構成新的「前見」，此種重複的解釋行為就是

「詮釋學的循環」，最終會形成一種「事實的圈子 (Faktum des Zirkels)」 (陳嘉映、王慶節譯，1927/1999)。可見，詮釋循環的精神強調：理解是在實際的對話中交互進行的，分析的過程是以「整體—部分—整體」的詮釋循環圈概念進出文本，以「先前理解」為基礎理解，經不斷溝通與對話，達成第二、第三層理解，持續進行直到意義把握為止 (楊深坑，1986)。因此，我的處理方式為：洞知自身的先前理解，掌握詮釋循環的精神，在第一次文本謄寫完畢後，反覆進行閱讀，進行意義單元的標籤、分析及與先前理解的對話、檢視先前理解的改變。這樣的過程不斷在第二次、第三次文本謄寫後循環進行，逐漸地，文本間的部分意義單元形成大小範疇不一的主題概念，最後再梳理成較易閱讀的結構性文本。

參、結果

本研究藉由未婚成年男子所描繪的父子互動關係生活經驗，經由詮釋循環的過程，梳理出以下五大主題來呈現。

一、現階段「淡然」的父子互動

(一) 對父子互動的感知 — 無話可說、亦無從說起

本研究的未婚兒子體認到與父親的互動是「非常的少」、「很少講話」、「比較不會跟爸爸聊」、「一天說不到一句話」、甚至「不會聯絡」，誠如受訪者的告白：

洪：我跟我爸互動非常的少，他不會問我上班或生活情況，我也很少問他，就…沒甚麼話好說。我們的…說起來有點複雜 (嘆氣)…從之前我還沒搬出來工作的時候就是這樣了。

金：平常不會去聯絡他耶…因為他現在住在店那邊，有時候我會拿一些東西過去，就是我媽會叫我拿。互動就…不多啦…真的很少跟我爸講話，跟我媽還比較多。之前每天住在一起的時候也不是很常在講話…也不知道要跟他說什麼。

葉：我有一些話比較會跟媽媽聊，但是比較不會跟爸爸聊…不知道要說什麼…每天就講…幾句吧，有時候一天也說不到一句話。

以符號互動論來說，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就是以符號為媒介的溝通，符號包含了語言、文字、聲音、姿勢、表情、形狀、顏色…等，但是其中以語言為最常被使用的媒介，顯然，這些成年兒子亦傾向以言語對話之頻率作為父子互動內涵的界定標準，以此觀之，他們所感知的父子互動的確少之又少，與母親的言語互動相較下多於父親。



然，互動「很少」也並非「全無」的狀況，研究者進一步追問父子在互動時的話題、何時會有互動、會一起進行哪些活動？

葉：我們不大會一起做什麼事耶，最多就是一起看電視，但也不會討論。如果講話就是…偶爾問他身體有沒有怎麼樣，因為年紀到一定程度了，就問一下這樣…也不會說什麼其他特別的…可能是爸爸比較不會主動吧，他不是會聊天的那一種人，所以你也很難去…不知道要說什麼。

洪：他不會主動跟我聊天，我也不大會找他聊天，說真的也不知道要跟他說什麼，有時候甚至會覺得有點尷尬…我們也沒有共同興趣，我覺得他除了愛算牌之外，好像也沒什麼興趣。

張：偶爾啦，他會主動問，但很少，而且他的話題我很難繼續。像他對政治很狂熱，但跟我聊政治的話，常常因為立場不同、話不投機就大吵。

金：大部分都是他講我在聽…算是會主動跟我講話…應該說訓話，不過大部分就是講人生大道理呀，我就是聽聽聽這樣，就算不同意，我也不會去跟他頂嘴，怕他會生氣…他會問我學校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呀，我就簡單的回答幾句…，自己覺得還滿敷衍的（不意思地笑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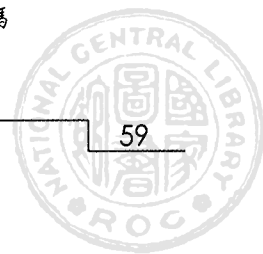
陳：我爸很…囉唆，脾氣也不大好，從以前開始常常一件事要反覆問很多次，我以前小時候比較有耐心，現在根本就懶得詳細回答，然後他就會生氣。至於聊天更不可能，我根本不知道要跟他說什麼，無話可說，也可以說是無從說起啦。

在受訪眼中，認為言語互動少的原因包含了：父親不主動、沒有共同話題，以致於「不知道要說什麼」、甚至「有點尷尬」的狀況。即便是爸爸會主動找話題，也無法發展成熱烈的持續談話，因該話題通常「很難繼續」，或因「話不投機」而引發衝突；或是父親單向地在扮演規訓的父職角色，兒子基於尊父規範或不想衝突，而難以豐富言語互動上的內涵，加上父子間沒有共同的興趣，因而形成此「無話可說」或是「無從說起」的父子互動疏像。

（二）對於互動少的詮釋 —— 祖父與父親如此，我與父親亦若是

有趣的是，我發現受訪者在敘說時，對於父子間的淡然互動，夾帶著半「無奈」、半「理所當然」的語氣，認為這是一種「正常」，也是「常態」，似乎可以感受到受訪者隱藏著「不是就是這樣嗎？」的「內心旁白」。

陳：可是我覺得這樣很正常呀，有話說才很奇怪吧……我爸跟我阿公也是這樣呀，我從小就很少看過他們講話，就算吃飯的時候我爸明明也在，但我媽



都叫我或我姐去叫我阿公，兩個（祖父與爸爸）就算坐在一起看電視，也沒講過什麼話…。

金：我同學跟爸爸也都沒什麼話說…好像大部分父子都這樣，我阿公跟我爸也是，我好像沒有看過或聽過誰跟爸爸很親密的…還滿難想像那種畫面的。

洪：通常父子關係都不會說很好，我是沒有聽到說特別好的，倒是比較常聽到不好的。

受訪者以「祖父與父親互動的淡然」以及「其他人也都是這樣」將自己的經驗合理化，顯示，父子互動的疏像可能因著代間傳遞而來，也可能是社會學習與文化規範的結果。Bowen (1976) 依據家庭系統理論提出多世代傳遞的概念，認為個體會重要人際關係中，重現他們從原生家庭習得的關係互動模式，甚至進一步將相似的型態傳遞到下一代。「負向的人際關係技巧」亦是社會學習論對於代間傳遞的假設之一，受訪者因成長過程中耳濡目染上兩代父子的互動模式，因此即便深刻體驗到父子互動的疏像，卻也認為理所當然。此外，華人傳統文化亦不鼓勵父子間建立親密的關係，「父子之嚴，不可以狎…，狎則怠慢生焉」（顏氏家訓，教子第二），這種不親教、不可狎的用意可能在維持父親的權威與倫理秩序（王叢桂，1995），使得父子間親密感反成為受訪者眼中「很奇怪」的現象。

（三）父子間直接互動缺乏：母親或家中他人主動或被動成為父子互動之牆

成年男子不僅自陳與父親的言談互動少，訪談結果也發現父子間缺乏直接溝通與互動行為，父子間常憑藉家中第三者（尤其是母親）作為發表意見、探聽消息或轉達訊息的管道，表面上父子間似乎是多了一項溝通平台，實際上此種狀況若無改變，家中重要他人可能在有意或無意中阻礙了父子更直接的互動機會：

陳：我們家吃飯的時候就是會在客廳邊吃邊看電視，像之前星光大道正紅的時候，我爸就很反對有人休學去比賽，邊吃邊看還邊故意在我面前說：「今嘛ㄟ少年人就是阿ㄟ，無好好讀冊，甘願唱歌…新聞還說他們休學去參加比賽！（台語）」，我覺得他是要說給我聽，我就轉過去跟我姐說：「你不覺得會賺錢就好嗎，現在唸書又不一定會賺錢！」

洪：像他之前就一直咳，我就叫我媽問他有沒有看醫生，如果沒有要趕快去看，如果沒錢我就幫他出。（為什麼你不自己問？）…（思考許久）因為我平常就沒什麼跟他說話，突然關心他健康好像很…突然，而且我跟他講他也不一定聽。



葉：我有事情會比較找我媽說，後來發現可能我媽也會跟我爸說，所以我就習慣還是跟我媽說，反正我爸到後來都會知道吧。

從兒子的敘述裡，我們理解了受訪者眼中的父子互動不僅淡然，事實上父子間可能還「隔了兩道牆」，一道是上述仍繼續支配父子互動關係的父權文化規範，另一道則是因著此規範而在實際互動時產生的邊際效應，即由母親或其他家人所主動或被動所構築的阻擋父子直接互動之牆，其中又以母親的機率最高，這可能與母親在家庭中多半被視為情感性的角色有關。張嘉真與李美枝（2000）的研究即發現，大專生與母親的親近度皆高於與父親的關係，與母親相比，子女不僅甚少向父親示愛，亦認為如此行為較不妥當。

二、隨者時間線而改變的父子互動關係 ——由「親」到「疏」

受訪者雖體認到現階段的父子互動是淡然的，卻也自呈這樣的關係並非一開始就如此，而是隨著受訪者的成長階段，父子間的互動由「親」轉「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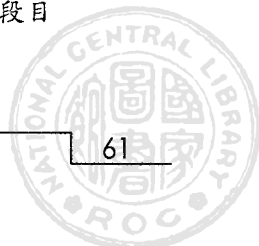
洪：小時候我們家是那種和樂融融的，跟爸爸也不會說無話可說，印象比較深刻就是吃宵夜吧，只要我爸領薪水了，就會帶我們去吃宵夜，雖然我不喜歡吃麵，但還是很開心就說「喔～走囉」…國中之後就真的很少講話，可能那時候我都在讀書…大學我很少在家裡，在家裡跟他互動也不多。我覺得小孩長大之後，父子關係好像沒有幾對好耶。

金：小時候互動比較多，他比較會管功課方面，考上大學後，他就比較不會去干涉一些事情…可能我也比較獨立，我也不喜歡他管太多…。

葉：以前求學的時候，感覺有點像兄弟，就會打打鬧鬧的這樣…像朋友，但是心事也是不會跟他們（父母）說……小時候可能很親密很正常，可是現在都幾歲了，太親密會有點奇怪吧。

張：小時候常帶我出去玩，互動也滿多，好像青少年期以後我就比較不大會主動去跟我爸聊什麼，因為那時候比較愛玩，都跟朋友啦，同學啦出去玩，反而跟爸爸比較沒有那麼多接觸。

受訪者似乎認為父子互動因著成長階段由親而疏是正常的現象。以Levinson的自我發展階段論來看，成年人已進入一個穩定時期，自我認定已經發展完成，且在心理上脫離父母而獨立，變得更為自主。Gould的成人發展理論也提出一樣的觀點，他認為成人會經歷一系列階段性的轉變並重新形成自我概念，漸趨自我認定，並遠離父母的世界（蘇建文等人，1991）。除此之外，父親在孩子生命階段前後期的角色也有不同的變化，父親在子代生命前期擔任玩伴、學習監督者、教導者與規訓者，但也因兒子達成前階段目



標、進入新發展階段而逐漸成熟與自主，進而缺乏共同任務的凝聚，相較於母親在家庭扮演照顧與情感的角色，父親因較具教化孩子的功能，而使父子互動亦侷限於工具性的活動，較少涉及情感與其他日常工作。

三、互動「疏」卻「不算差」的父子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我認為父子關係的好壞應可由互動的親疏程度與頻率來判別，但令我驚訝的是，多數的受訪者自認與父親的關係並「不算差」：

張：我們關係喔…雖然偶爾會吵架，但是不算差吧，就一般一般啦。雖然互動不多，但偶而還是會彼此關心。

金：還ok啦，我同學他們也都跟我差不多的狀況阿，雖然是不大講話，但關係也不是說不好就是了。就是比較…不親密而已。

陳先生：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差…我也不知道，至少沒有常常衝突吧。

顯然，我帶著「關係來自互動本質」的想法在此部分並不盡然相符。為何如此？孫頌賢、修慧蘭（2004）針對大學生親子界限的研究即發現，親子界限可分成「關係界限」（包含親密、侵犯、相安等界限）與「自我界限」（包含認同、否定、壓抑等自我感受）兩層面，形成三大「親子關係-自我界線」模式：「親密-認同感」、「侵犯-否定感」以及「相安無事-壓抑感」。其中「相安無事-壓抑感」指當子代知覺親子關係屬於較為疏離的相安無事狀態時，個體在此關係中的自我經驗會感到缺乏互動與回饋，情感是壓抑與退縮的。本研究的兒子所感知的父子關係即偏向「相安無事」的類型。在壓抑感的部分，研究者也發現五位受訪者在表達自己與父親的互動情形時，常出現欲言又止、不知如何描述的窘境，一開始常用「還好吧」、「就是這樣呀」等極為簡短的句子來回應，明顯地，這些受訪的成年男性在表達自己與父親的關係時，有著壓抑內在的特質及現象。這可能如同孫頌賢與修慧蘭的研究發現：當溝通缺乏深度與廣度（如金先生父親與兒子的話題多半在學業問題、張先生父子多半僅針對政治問題）、彼此以為對方知道自己內心想法、事實上缺乏實質的溝通歷程時，子代容易經驗疏離及失望的壓抑退縮感（統稱「壓抑感」）。除此之外，研究者認為，這也可能起因於社會對於男性角色的期待，使他們必須以較為理性的思考模式溝通、觀看自身的內在情緒經驗；也可能是因為父子教養模式所造成，如父親在教養過程中，常扮演工具性導向的角色，乃至於兒子成人時對於情感表達的困難（陳安琪，2003；郭屈芳，2006；Hosley & Montemayor, 1997）；更有可能是研究的問題，迫使他們首度必須去面對、思考及表達內在對於父親與父子互動關係的情緒與感受，這對於不善表達、從無機會省思內在情感的成年男子來說，確實有其困難度存在。



此外，葉先生的一段話亦「點醒」我去「意識」到原來我一直帶著女性的「視框」去進入他們的世界：

妳說感情好或不好，可能不能用妳們女生的思維去看…就是不能用互動的頻率去看感情好不好，我個人是用這種想法去看啦…所以我覺得雖然我們互動沒有很多，但其實彼此有在互相關心，會想去關懷，所以我覺得我們關係很好呀。

葉先生是唯一自陳他與爸爸的關係是「很好」的，雖然口語的互動與溝通不多，但肢體上的確有一些情感的表達：「我們偶爾會kiss勒，就是我覺得要關懷他們啦」。可見父子間雖然口頭的溝通較少，但不代表沒有其他的互動型式，對葉先生來說，姿勢某程度上來說也是一種被運用來與父親互動的符號。且隱藏在肉眼看不到的互動，例如心理的關懷與牽掛，亦是關係判斷的準則之一，也說明了親子相處時的品質重於次數。如陳安琪、謝臥龍（2009）所提，倘若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台灣脈絡下的父子關係，幾乎很難窺見其中內隱未現的親密，既缺乏情感上的直接表達，亦較少肢體方面的接觸，所有外顯可辨識的行為是難以察覺的。

四、影響父子互動關係樣貌之歸因

訪談發現，價值觀差異、性格特質、父職角色、社會規範、性別、以及父職在生命階段早期的缺位等，是未婚成年兒子用來解釋影響其父子互動關係的主要歸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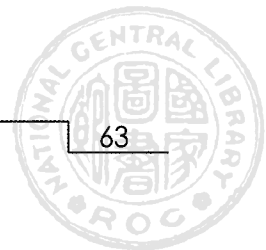
（一）價值觀的不同

所有的受訪者中，張先生與父親最常發生衝突，肇因通常是父子倆的觀念不同，而雙方皆無法同意對方的立場，導致激烈的口角：

張：我們衝突原因通常就是政治，像之前我真的覺得阿扁做很爛呀，所以我就會批評他，可是我爸是深綠的，他就會覺得應該多給他（阿扁）一點時間阿什麼之類的。

不過，這樣的論辯在張先生的眼中並不會影響他與父親的關係，但是父親的想法似乎就沒有他那樣「單純」、可以「劃分」得那麼清楚：

我不知道我爸是怎樣，但是我是分的很清楚，就是你可以討論這件事討論的很激烈沒有關係，但是討論過了就是過了，如果要吃飯了就是吃飯，我覺得那是兩回事啦，我會把他分的很清楚，但是我爸都還是會很氣，覺得我不應該跟他吵，他說的才是對的。



金先生與父親的衝突則是對於事情重要性的排序看法不同，例如金先生學校事情比較多，很多時候無法到父親店裡幫忙處理事情，口角衝突就會產生：

爭吵有…就是可能我爸要我去藝廊幫忙，可是我學校有事，他會覺得應該要去幫他忙，但我就會說但是沒辦法呀，結果講一講就吵起來了。

首次將社會衝突理論運用在家庭研究領域的Sprey (1969)，運用了衝突理論的幾個基本概念：人性、為有限資源競爭、階層與權力（同時也是造成衝突的原因）等，去解釋家庭衝突，主張「家庭即為一衝突系統」。其中權力在華人父子關係中有一定的影響力，由於傳統「支配性父子關係」的價值觀，兒子多只能奉行父命，但當此文化傳承與外在環境變遷在同一時間流中產生變化時，不免導致家庭中的父子產生認知或行為上的矛盾、衝突或不知所措（陳安琪，2003）。

（二）內向、被動的人格特質

關係既然由兩人組成，個體的人格特質亦影響人際關係內涵。除葉先生外，其餘的受訪者皆體認到「個性」對父子互動關係有一定的影響力：

洪：跟老爸的互動最差，因為老爸在家裡讓人覺得有點小陰沉，很少聽到他對我們小孩說什麼，應該說（他）跟家人互動都很少吧。

張：因為我爸也不是那麼主動，像我小時候覺得我舅舅是比較好的爸爸，因為他常常都會接小孩上下課呀，或是問小孩要不要吃什麼呀，可是我爸是比較…內向啦，他比較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他可能比較不會去表達他對家人或是對小朋友的感覺或是愛這樣。我覺得我也是內向，可能也會影響我們的互動吧…加上我爸又是那種很固執的那種人。

金：個性吧…我會這樣覺得，因為我比較不希望被干涉，除非他問，否則我很少會主動會說我在學校發生什麼事情。

陳先生：我們兩個都比較…內向吧，不大會主動去跟對方怎樣。

洪先生認為父親個性較為陰沈，張先生的父親則較為內斂，皆不會主動與兒子互動，而根據我訪談時的觀察，受訪者的人格特質其實也都較為內向。在雙方都較被動、內向、又不知如何表達情感的情形下，互動頻率自然較低。

（三）威嚴的父職角色、不稱職的爸爸

華人的社會中，有「角色」即有「規範」，尤其華人家庭以父軸為主，在這樣的家庭中，父子關係呈現了許多屬性，包含權威性、包容性、連續性與非性性（莊耀嘉、楊



國樞，1997)，其中的權威性解釋了父親角色的呈現多是權威、難以接近的，也影響了父子的互動關係：

張：（爸爸）在我小時候比較有父親的威嚴，長大後也是會有。兩個時期比起來的話，現在是還好啦，但是小時候比較多，所以小時候不大跟他說話…會比較怕。

金：我爸是一個比較…他生活比較封閉一點，可能也比較權威一點，他是很權威型的。

陳：他是傳統的那種男人，有點權威又很大男人主義，所以對家裡小孩還滿嚴厲的，尤其是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是兒子的關係。

然，當父親對於其角色規範沒有達到所謂「社會標準（規範）」時，所影響的不只是自身父職的實踐，更關乎父子關係的好壞，如洪先生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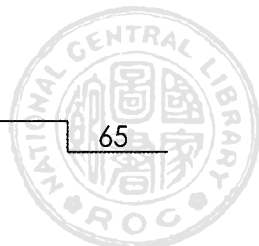
國中前，父親是我的好榜樣，他不會跟我說什麼大道理，但是當我行為偏差過多的時候，他就會處罰。我記得每個星期都會有認錯時間，他會問我們三個小孩這星期做錯了什麼，自己要承認然後說要打幾下手心…還有一次，我偷了一些老鼠炮跑回來跟家人炫耀，晚上就被他毒打了一遍…那時會覺得爸爸很厲害，希望有一天可以像他一樣什麼東西都會。到大學的時候，老媽把他一些不好的事情告訴我，他就是我的壞榜樣，讓我知道什麼當家裡有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一家之主後，整個家庭會變成什麼樣子。不過，我老爸有一個非常好的優點，就是他很孝順，這是我需要好好學習的地方。

洪先生的傾吐，證實父親的傳統職責被認為應是「任勞任怨，努力工作打拼的」（王叢桂，1995）。許詩琪、黃曬莉（2009）的研究也發現，在子女心目中，會以角色義務的概念來評斷父母的所作所為，父母違反角色義務，可能瓦解親子關係。

然，洪先生對於父親的看法並非「全好」或「全非」，他仍試圖由父親身上找尋值得效法學習之處。受訪者間也普遍存在一個現象，即無論父子互動好壞，都覺得應該要盡孝道，顯現出傳統華人的孝道在大多數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樣貌，以父子關係最差的洪先生與關係最好的葉先生為例：

洪：（我）沒有想過要去改善我們的關係，就是覺得說有一些基本的孝道要盡啦，但是那只是義務性質，就華人的那種義務性質。

葉：我覺得現在角色不一樣，以前是他照顧我，現在反過來是我要照顧他……我覺得男生應該是看說有沒有負責吧，我個人是用這種想法去看啦，以這種方式去實踐，去關懷、關心、孝順他們。



孝道在華人世界深被重視，儒家主張「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佛家則強調對父母的感恩、發之於身的恭敬與態度。即便少部分受訪者與父親間存在著許多複雜的矛盾、衝突與問題，但盡孝道的責任與義務卻也是他們共同的心聲，更是一種社會規範的展現。

(四) 撒嬌的女兒、不會撒嬌的兒子

無論家中是否有異性手足，所有的受訪者都一致認為「性別」是一個影響父子關係的重要因素，家中有姊姊的陳先生與金先生提到：

陳：我們家很明顯是一個疼一個，我爸疼我姐，我媽比較疼我，所以父女關係比較好。從小時候要零用錢就可以看得出來，如果跟我爸要，我爸會問我要多少、要做什麼的，如果是我姐要，他都會多給，也不大會問要幹嘛，所以後來我都直接跟我媽要。

金：我爸比較疼我姐啦，我爸、我媽都比較疼我姐，可能因為我姐小時候身體比較不好，然後我媽是因為我姐身體不好疼我姐，我爸可能...可能父女比較和得來還怎樣（笑），我也不曉得...

在聽金先生描述時，我卻可以明顯的感受到他語氣中的「落寞」，他一方面很清楚自己是家中較不受寵的一方，另一方面又「設身處地」為父母較疼姊姊的事實尋找「合理」的理由。此外，我也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便受訪者為獨生子（如張先生、葉先生並無兄弟姊妹），也不約而同的提及父親與小孩之間的互動是存在有性別差異的，即「女兒跟爸爸的關係通常會比兒子跟爸爸的關係要好」，而受訪者幾乎一致認為造成這差異的主要原因是「男生不會撒嬌」：

葉：我覺得男生比較不會像女生這樣，像撒嬌...男孩子比較不會去那個（撒嬌），畢竟男生比較獨立呀，不會像女生那樣，一般會看到女兒跟爸爸膩在一起，但是很少看到兒子跟爸爸...就放在心裡，比較不會說。

張：我聽過爸爸跟女兒互動很好的，但是我身邊沒有聽過父子互動很好的...可能男生也不會特別去講「我跟我爸互動很好」之類的...也不會像女生一樣撒嬌吧。

洪：我想有一個比較重大原因是，通常父子之間...男生跟男生之間，很多事情是要有共識，有一些相處的經驗，有一些共同的興趣或嗜好，才可以變成一個很match的關係，如果假設我剛剛所講的那些東西如果沒有的話，事實上很難像女生跟爸爸那樣...然後可能男生本身也不會去撒嬌啦，所以又少了一樣武器，我覺得女兒就可以跟爸爸或媽媽撒嬌...通常父子比較不會有好的關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三位受訪者一致提到「男生不會撒嬌、女生會撒嬌」，顯示性別角色的規範的確在父子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一般認為，撒嬌，裝可愛，親密…等外顯行為是女性化的情感表達方式，對於強調男子氣概（獨立、自主、勇氣、剛強）的華人男性而言，一旦逾越男性角色規範出現這些女性化行為，可能產生被視為異類的恐懼感，且對自身的男性自我概念也會有所衝突。亦有研究發現，阻礙男性達到高親密度的因素之一就是男性討厭情感的脆弱與傾訴（曾端真、曾玲珉譯，1995/1997）。邱珍琬（2004）的研究也發現，大學生認為父親在對待不同性別子女方面，也有些不同，例如「對待女兒像是寵物與情人」，且「對女兒的關愛會很公開表達」。是不會撒嬌？還是不能撒嬌？研究者認為事實上也受到性別角色規範及男性對於「同性親密」忌諱的箝制。

（五）生命前期中缺乏參與的父親

洪先生年幼時原本與父親的互動關係還不錯，但後來因父親開始沈迷賭博，對孩子漠不關心，未善盡父職責任，而逐漸影響其父子關係：

他在我國小以前感覺是有工作的，國中以後就開始向下沈淪了。其實國中那時候還不知道家裡發生事情，只是覺得我爸爸怎麼突然沒工作了，開始在開計程車了，然後忽然又沒有開計程車了……事實上那時候我都不不是很瞭解，他也很少在家，就算在家也一直在房間，一直到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我媽才讓我知道他在賭博，我才知道小時候他在房間都是在算牌，根本沒在管我們。

這樣的特殊生活事件造成洪先生在生命階段早期多半時間是呈現父親缺位的狀況，使得洪先生對父親產生較為負面的觀感及印象。過去研究發現父職參與和父子關係或親密感大多存在正相關，可見生命前期父職的參與與否，直接影響成年後父子雙人的互動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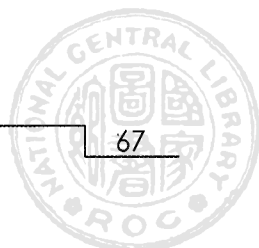
五、父子互動關係在代間傳遞上的意欲轉變

（一）現階段不想改變現狀

既然在受訪者自陳的父子互動世界中是較為「淡然」的，關係也是「一般一般」，我不禁好奇是否他們曾想過要進一步的改善？

陳：如果沒有話講就…不會特別講什麼，反正家人應該就是這樣，有話就講，沒有話的時候就不用講，還很刻意聊就太客套了（笑）。

張：沒想過耶，我覺得現在這樣也沒什麼不好，而且我覺得是個性問題，要改很難。



洪：在2003年的時候，因為老爸欠黑道錢，又沒有錢還，我們被迫在一個星期六的早上搬離住了十幾年的家，一家九口就這樣的分崩離析。之後，我們三個小孩跟銀行借款，把部分的錢還給放高利貸的人，老爸也當了一陣子的好人…就是到老舊公寓當大樓警衛…但是不到四個月，他的壞習慣又來了，我就對他完全放棄了。

金先生：還好耶…就這樣呀…已經習慣了。

明顯地，即便受訪者都瞭解他們父子互動的狀況並不算理想，但因自覺的關係不算太差，除了洪先生對父親已徹底失望、不願再與其有太多互動外，其他的男性似乎覺得沒有必要去做改變。我進一步的探試「為何不想改變？」得到的答案都是「沒想過耶」、「不知道耶」、「很難吧」。我想這些兒子背後的聲音可能是「不知道怎麼去改變，所以乾脆以不變應萬變」、「這樣的互動關係還算正常」、「對未知的恐懼：害怕改變所有做的事，以及害怕改變過程中及改變後的結果」。當然，這只是我的詮釋，即便受訪者在互動過程中表示同意，但或許真實的答案，受訪者還需要時間慢慢深入地去知覺與體驗。

（二）期許自己作爸爸時，能有「像朋友般」的父子互動關係

不過，從受訪者的言談中發現，其自身的父子互動關係其實默默影響他們未來對自己成為爸爸時的父職與父子關係的期許：

葉：如果我有兒子，我會很溺愛他吧，因為我小時候我要什麼我爸都會買給我，但是我也沒有變壞…當然我不會太誇張啦，溺愛這詞用得太重。我會給小孩空間吧，就是他們的需求盡量滿足，不要讓他們有遺憾，而且希望可以跟他們像朋友那樣，什麼都跟我說。

張：應該比較像朋友吧，我覺得我不太會有父親的威嚴，小朋友大概不會想鳥我的那一種，就是維持像朋友的關係。

洪：以後跟我兒子喔…我希望是做一個榜樣啦…當然這個榜樣不是一個很top的那種完美…事實上我對小孩的期望不會太多，但今天他如果想要學什麼東西的話，可以透過我去學習，或是看到我會覺得說「這是好的，或是有可學習之處，或是有不可取之處他可以藉機學習，我希望是這樣。那我爸爸就是沒有做得很好，我在看他做得那條路的時候會覺得他做得不是很好，所以我會跟他走反方向，然後如果反方向走得越成功，我可能就會覺得我爸爸越不好，我的case是這樣。所以我會希望我以後如果有兒子，要跟像平輩一樣相處，但同時我也要是一個好的榜樣。

受訪者皆以自身的經驗去「期許」或「改善」未來的父子關係。以父子關係最好的葉先生為例，他未來所期待的父子關係與他與父親的關係有代間傳承的現象。而張先



生、洪先生則是避免與自身的父子關係「重蹈覆轍」，期望未來身為父職時，可以維持像朋友的關係，或是做良好的榜樣。王叢桂（1995）研究亦發現，幼年缺乏父親陪伴的負向經驗是使部份父親期望建立與上一代「威權式父子關係」不同的「朋友式父子關係」。本研究受訪者夾在過去文化規範與力求改變之間，將自己定位成試圖改變、賦權而非父權的一代。

肆、討論

本研究發現，未婚成年兒子與父親的互動是較為「淡然」的，此淡然的感受來自於受訪者傾向以「言語對話之頻率」作為父子互動內涵的界定標準，父子間常因缺少共同的興趣或話題切入，或避免因價值觀不同而引起衝突，而導致有「無話可說」或是「無從說起」的互動疏像，反而與母親的言語對話頻率多於父親。邱珍琬（2004）針對大學生對父親形象的研究即發現，聊天對話不是一般父子的互動方式，與父親直接溝通也並非容易之事。但由於母親在家庭中主要擔任照顧的主內角色，相較於父親的主外，母子比父子有更多溝通機會，使得父子的親近度落後在母子之後（李美枝，1998）。

再者，受訪者認為此種淡然的互動呈現早就由上代的父子開始，加上觀看生活中的他人經驗也是如此，因而將此種父子互動疏像透過代間傳遞與社會學習的意涵加以合理化。此外，成年男性對於自身表達脆弱或內在情感是有其困難（郭屈芳，2006），這可能是受到性別角色典範與華人親疏尊卑在父子關係中（如「遠其子」）交互影響有關。父權文化形塑出的「男子氣概」是完美的男性形象，欠缺了情感的工具性特質，使得男性之間的親密行為相較於女性之間較無「高度自我表露」（曾端真、曾玲珉譯，1995/1997），而使父子在互動關係上缺少了「親密度」的展現，必須藉由家中他人進行間接互動，卻也更強化父子間的距離感與界域，又繼續在世代間傳衍與複製。黃聖桂（2001）即指出傳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亦透過父母對自我角色認知及社會化過程代代傳承。可見，父子間口頭上、面對面的直接親密互動，可能是在性別角色規範下較「做不來」的，父子之間的疏離就在華人這套性別角色規範與父權文化下被合理化的解釋與傳遞。

此外，受訪者父子互動親疏的感知並非恆久不變，而是隨者子代發展逐漸由「親」到「疏」，此與一些西方研究發現父親與孩子的關係會隨孩子成長而更為親密並不相同（Levant, 1980; Roberts & Zuengler, 1985, 引自邱珍琬，2004）。這些西方研究的論述重點在於父母的權力伴隨孩子的成長而逐漸減少，雙方地位漸趨平等而互惠，因此關係距離會逐漸轉為親密。然，以華人文化來說，家中的父親與成年兒子還受到文化對男子氣概的規訓與禁制，促使男性在同性之間的互動，顯得小心翼翼，情感的表露因而內隱且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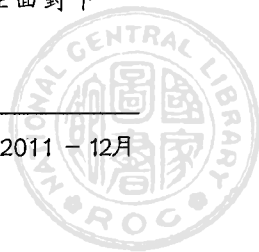


乏彈性（陳安琪、謝臥龍，2009），使得兒子在成年後，即使感到父權下降，雙方互動方式囿於這種對男性角色的期待與承襲，仍難親密地與父親互動。

有趣的是，這些未婚成年男性在描繪父子關係好壞時，並不依互動的頻率或親疏作為判斷標的，而注重內心情感與關懷的意向性是否存有（如前述葉先生表示「偶爾問他身體有沒有怎麼樣」、「…我覺得要關懷他們」；父子關係較不好的洪先生發現父親咳嗽，也會請媽媽提醒父親看醫生；張先生也認為雖然與父親偶爾會吵架，「還是會彼此關心」），此與關係在理論層次上的內涵並不相符，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在文化上，或說至少在此研究中有意義的發現。換句話說，父子表面互動上的缺乏，並不代表內心情感亦如是，這種特殊的詮釋依據，或許是華人父子關係相較於西方強調外顯情感表露所呈現出的不同文化內涵。如同陳奕樺（2009）研究發現，遵奉父權、孝敬長輩的價值信念與禮法原則仍是存在於現今的社會內，使得父子之間的互動較少有情感的交流，但這種「說不出口的愛也能成爲一種真實」。

本研究受訪者認為影響父子關係與互動品質的主要原因包含了：價值觀差異、性格特質、父職的社會規範、性別、以及早期的父職缺位。如父子倆處事觀念的不同，造成兩人很難進行溝通，甚或引發衝突，但由此也可看出過去傳統支配性的父子關係，在此部分不再是父命子從，子代也能發聲。而太過內向與被動的人格特質，也難以引發互動行爲，如過去研究所述，親子關係可能與家庭系統所指出的自我分化，以及子女的對於自立與依賴產生的矛盾有關，也可能來自父母、來自於子女本身的特質（李瑞婷，2006）。此外，社會文化對於父職角色的規範（權威）以及在子代生命前期是否盡到父職責任，更影響成年兒子所認知的父子關係良窳（許詩琪、黃曬莉，2009）。至於性別部分，受訪者男性以「是否會撒嬌」作為父子與父女關係親疏互異的解釋，事實上，受訪者口中的撒嬌只是一個外在行爲上的展現，實際指涉的仍是性別角色規範、男子氣概、同性忌親之潛在影響。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面對現階段父子互動的疏離現況，皆不打算改變，卻由自身經驗展望未來，試圖跳脫代間傳遞的框架，希望當自己爲人父時的父子關係能有所鬆動與轉化。王叢桂（2000）研究發現，男性無論是否認同父親，往往會以父親的親職行爲作為自己實踐父職所參照的首要腳本，但McBride & Darragh（1995）二位學者則認為，與上一代的父子關係雖是男性實踐父職的影響因素之一，但過於疏離或負向的父子經驗卻可能促使下一代不願重蹈覆轍，而將之轉化爲積極參與父職的動力。國內陳安琪（2003）的研究即顯示，跨世代父子關係之所以產生流動現象，沒有全然複製延續，關鍵因素在於子代將過去父子關係的不滿感受或挫折體驗當作負面示範，同時化成自我父職角色認知基模，選擇與過去經驗不同的實踐方式；陳奕樺（2009）的研究也發現，華人長子雖在傳統傳遞道理及禮法、缺乏情感交流的父權家庭中長大，但體認出在面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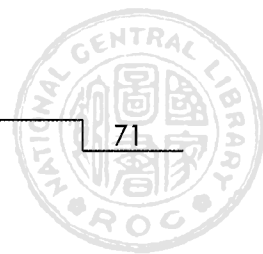
一代時，應超越以往長子情感表露的方式，讓自己在新的時代，能創造出更適合的家庭氣氛。加上現代社會的氛圍逐漸鼓勵父子間的親密連結，這些未來的父親自然希望能擁有更平等、親密的父子關係。但就現階段而言，本研究受訪者在面臨時代的變遷進步與華人文化於同一個時空中衝擊時，同時產生代間傳遞與代間轉化的矛盾內涵，雖然在態度上期許自己成為轉變的契機點，但比起實際去改善與父親的互動關係，可看出新思想在外顯行為的實踐上仍不比規範上的影響明顯。這或許是未來代間矛盾研究值得切入的另一個觀點。

承上，本研究發現未婚成年男性的父子關係存在著「表面淡然」卻又「思之念之」的模糊內涵，而上代父子關係的淡漠與隱諱，彼此一口合⁵ (cohort) 的未婚成年男性視為理所當然，他們卻又在社會氛圍的形塑與自身經驗的轉化中，期許一種亦父亦友的未來父子關係⁶。不過，父子的互動方式與關係，顯然仍難脫離傳統文化與性別角色規範所限制的框架。

未訪問父親一直是本研究的一個缺憾，畢竟研究雙人關係要有兩人以上的角度才較具有互動的意義（並非要找尋共識，有時差異才是意義的所在）。當初之所以未將父親納入主要原因有三，一方面是想先鎖定未婚成年男子為探索對象，單純的想以他們的視框進入他們與父親的生活世界做該現象的理解與詮釋；另一方面則是現實的考量，因為多數受訪者在我進一步詢問是否可以訪談父親時，皆「面有難色」，或直接回絕：「不要吧，有點怪」、「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他說耶」。再者，若以符號互動論的觀點來看，「研究者必須根據行動者的意義去理解人類行為」，因此不同家庭成員對家人關係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都是從他們的主觀認知經驗中去反映他們的看法。因此，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從符號互動論與詮釋現象學的角度去思考的是：也許家人關係本來就沒有客觀的唯一真相可言。以詮釋現象學的角度來說，未婚成年男子個人透過語言對於其父子關係經驗的知覺與詮釋，以及本文所能帶領予讀者的意義與詮釋，或許才是意義的所在。

⁵ 「口合 (cohort)」指出生時間接近而有許多共通的社會特徵或共同歷史與文化經驗的個人或年齡團體，亦有人稱為族群、世代或同期。

⁶ 但也有可能是受訪者所自呈的父職轉化，是將焦點置於其子代的生命週期早期，而非子代成年後，此為當初未向受訪者釐清的盲點之一，此點感謝唐先梅老師於研討會發表時的提醒。



另外，在進行資料分析與詮釋的過程中，我常常遭遇到一個兩難：同一段語料當中，可能相嵌了兩層以上具有連續性的意涵，很難將其分割到不同的主題分析軸線裡。我曾反思是否我的主題分類不夠恰當、詮釋循環做得不夠深入、或是我與受訪者互為主體性展現不足，而導致這樣的情況發生，但或許現象本身即是「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很難以文本的類別方式分割清楚。也因此，我不敢說本文將我與受訪者彼此的理解與視域融合完美呈現、完全貼近受訪者的實際經驗，尤其，雖然我不斷強調互為主體、文化角色規範對此研究與發現的重要性，但我以一個成年女性涉入成年男性的世界，在過程中是否真正做到互為主體與同理，是我認為重要卻又還拿捏不到要點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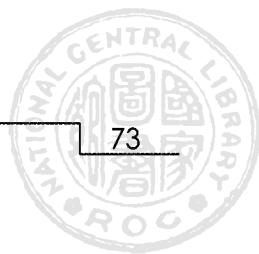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 王叢桂 (2000)。促進參與父職因素的探討。*應用心理研究*, 6期, 131-169頁。
- 王叢桂 (1995)。工作價值的傳遞與變遷及其影響因素的探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 NSC84-2413-H031-002)。台北: 中華民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王正婷 (2007)。國中生英語科及數學科學習態度、父母教養方式與其學業成就之關係: 以 TEPS 資料庫資料為例。*中學教育學報*, 14期, 55-76頁。
- 李瑞婷 (2006)。成年前期子女與退休父母的親子離合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台北。
- 李美枝 (1998)。中國人親子關係的內涵與功能: 以大學生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 9期, 3-52頁。
- 李玟儀 (2002)。國小高年級學童氣質、親子關係與其情緒調整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嘉義大學, 嘉義。
- 利翠珊、張妤玟 (2010)。代間照顧關係: 台灣都會地區成年子女的質性訪談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3卷, 1期, 99-124頁。
- 吳嘉瑜 (2004)。親子關係的另一端: 成年期親子關係特色。*諮商與輔導*, 217期, 20-24頁。



- 卓馨怡、利翠珊 (2008)。成年子女的孝道責任與焦慮：親子關係滿意度的影響。《本土心理學研究》，30期，155-197頁。
- 邱珍琬 (2004)。大學生眼中的父親形象-以一次焦點團體討論為例。《教育與社會研究》，6期，69-108頁。
- 林昭溶 (2005)。技職體系青少年中期的親子關係 (一)：內涵之探討。《應用心理研究》，25期，213-248頁。
- 林如萍 (2000)。老年父母與其最親密的成年子女之代間連帶。《中華家政學刊》，29期，32-58頁。
- 高淑貴、林如萍 (1998)。農村老人與成年子女之代間交換。《農業推廣學報》，15期，77-105頁。
- 涂妙如 (1998)。幼兒與母親以及與教師間的依附關係對幼兒社會與學習行為之影響研究。《弘光學報》，31期，61-111頁。
- 陳奕樺 (2009)。一位華人長子宿命的傳承與轉化。《耕莘學報》，7期，117-130頁。
- 陳小雯 (2006)。倫語中的父子關係與世界人權宣言的婚姻自主權之探討。《應用倫理研究通訊》，39期，60-67頁。
- 陳安琪 (2003)。以批判性女性主義觀點探討中年父親父職角色實踐與父子關係之跨世代影響。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
- 陳安琪、謝臥龍 (2009)。從隱身靜默到眾聲喧嘩：論父子親密關係之跨世代影響。《應用心理研究》，42期，215-251頁。
- 許詩琪、黃曬莉 (2009)。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華人父母角色義務對親子衝突與親子關係的影響。《中華心理學刊》，3期，295-317頁。
- 張嘉真、李美枝 (2000)。親子間情感行為的溯源與文化塑形。《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3卷，2期，1-35頁。
- 孫頌賢、修慧蘭 (2004)。大學生的親子界限：親子關係—自我界限量表編製與模式初探。《測驗學刊》，51卷，1期，45-78頁。
- 郭屈芳 (2006)。大學男性父子經驗之探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北。
- 莊耀嘉、楊國樞 (1997)。角色規範的認知結構。《本土心理學研究》，7期，282-338頁。
- 畢恆達 (1995)。生活經驗研究的反省：詮釋學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4期，224-259頁。
- 張春興 (1992)。《現代心理學》。台北：東華書局。



- 張宏文 (1992)。實用人際關係學。台北：商鼎。
- 黃光國 (2003)。社會科學的理路。台北：心理。
- 黃聖桂 (2001)。對青少年子女親子管教的文獻回顧：性別敏感的觀點，*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4卷，1期，89-111頁。
- 楊深坑 (1986)。教育學科學性之詮釋學分析。*台灣師大教研所集刊*，28期，33-73頁。
- 楊國樞 (1998)。家族化歷程、泛家族主義及組織管理。載於鄭伯璜、黃國隆、郭建志（主編）：*海峽兩岸之組織與管理*（20-59頁）。臺北：遠流。
- 劉惠琴 (2000)。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應用心理研究*，6期，97-130頁。
- 蔣愛莉 (2008)。淺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父子關係的嬗變。*聊城大學學報*，2008卷，2期，229-231頁。
- 蔡玉瑟 (1996)。國小高成就與低成就資優兒童的父母教養方式與學習行為、生活適應、成就動機之比較研究。*臺中師院學報*，10期，525-567頁。
- 蔡素琴、廖鳳池 (2009)。從女性主義觀點解讀親子衝突歷程中的母職經驗——以一位家有青少年子女的母親為例。*諮商輔導學報*，20期，85-125頁。
- 鄭家棟 (2003)。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父子關係及詮釋的面向——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說起。*中國哲學*，5期，9-17頁。
- 蘇建文、洪小危、柯華葳、林美珍、吳敏兒、辛曼玲、陳李綢、林惠雅、陳淑美 (1991)。發展心理學。台北：心理。
- Heidegger, M (1999)。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局。（原著出版於1927）。
- Verderber, R. F. & Verderber, K. S. (1996)。人際關係與溝通（曾端真、曾玲珉譯）。台北：揚智文化。（原著出版於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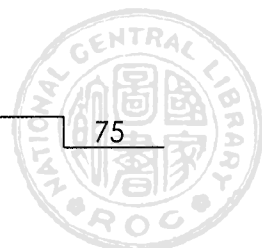
英文部分

- Bowen, M. (1976). Theory in practice in psychotherapy. In Guerin P. J. (Ed.), *Family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42-90). New York: Gardner Press.
- Dunifon, R., & Kowaleski J. L. (2002). Who's in the house? Race differences in cohabitation, single parenthood, and child development. *Child Development*, 73 (4), 1249-1265.
- Doorn, M. D. V., Branje, S. J. T., & Wim, H. J. M. (2011).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conflict resolution styles in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 four-wave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0 (1), 97-108.



- Hosley, C. A. & Montemayor, R. (1997). Fathers and adolescents. In Lamb, M. E. (Ed.),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pp. 162-178). NY: John Wiley & Sons, Inc.
- Karazsia, B. T., & Wildman, B. G. (2009).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arenting behaviors on maternal affect and reports of children's behavior.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18 (3), 342-350.
- Katz, R., Lowenstein, A., Phillips, J., & Daatland, S. O. (2005). Theorizing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 solidarity, conflict, and ambivalence in cross-national context. In Bengtson, V. L., Acock, A. C., Allen, K. R., Dilworth-Anderson P., & Klein D. M. (Ed.),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y & Research* (pp. 393-420).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Levant, R. F. (1980). *A male perspective on parenting and non-parenting*. Leipzig, West Germany: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 McBride, B. A., & Darragh, J. (1995). Interpreting the data on father involvement: Implications for parenting programs for men. *Families in Social*, 76(8), 490-497.
- Pillemer, K., Suito, J. J., Mock, S. E., Sabir, M., Pardo, T., & Sechrist, J. (2007). Capturing the complex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Exploring ambivalence within later-life famili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3, 775-791.
- Peters, C. L., Hooker, K., & Zvonkovic, A. M. (2006). Older parents' perceptions of ambivalence in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children. *Family Relations*, 55(5), 539-552.
- Palmer, R. (1969).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prey, J. (1969) .The family as a system in conflic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1, 699-706.
- Ward, R. A., & Spitze, G. (2009). The more the merrier? Multiple parent-adult rela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 161-173.
- Wintre, M. G., Yoffe, M., & Crowley, J. (1995). Perception of parental reciprocity scale (POPR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with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Social Development*, 4, 129-148.

文稿收件：99年10月21日
文稿一修：100年7月21日
接受刊登：100年11月8日



Unmarried Adult Sons' Percep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Fathers

Yun-Ju Chen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from the standpoint of unmarried, adult sons, analyzing their perceptions, feel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toward their experiences of father-son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To achieve the study's purposes, the author applied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with in-dept. interviewing with five unmarried, adult males for data collection, to discover the implied meaning behind the phenomena that they displayed. Thematic-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all materials collect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equency of talking to each other was used by interviewees to identify the interaction quality with their fathers.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ir fathers shifted from strong to weak as they became older. The study also found relationships were weak and lacked intimacy in this life stage. However, those sons do not think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fathers are terrible; however, they have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 that differs from western culture.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fathers are weak now, they think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make a change.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hese interviewees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fostering a friend-like relationship instead of father-son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sons in the future. The sons in this type of relationship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transformative agents of the last three generations. These results emphasize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is still shaped by a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ulture, fatherhood norm, and gender-role stereotype, which is found in the cognition schema of these unmarried-adult sons.

Keywords : Father-Son Relationship, Patriarchal Culture, Fatherhood

